

权利保障、信息能力与农户宅基地退出政策满意度

——基于安徽省金寨县 335 个农户样本

孙鹏飞 赵凯¹

【摘要】 基于宅基地退出试点区安徽省金寨县 335 户农户的微观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权利保障、信息能力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政策满意度的影响。结果表明：权利保障和信息能力均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政策满意度有正向显著影响；信息能力在权利保障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政策满意度影响中起增强性调节作用；信息获取能力和信息处理能力的增强作用均显著，且前者的增强作用强于后者；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分析表明，政策认知在信息能力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政策满意度中发挥中介作用。最后，提出切实保障农户在宅基地退出中应有权利、提升农户信息能力、加强对宅基地退出政策的宣传和解读等建议。

【关键词】 权利保障 信息能力 宅基地退出政策满意度 政策认知

【中图分类号】 F30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7470(2020)-08-0042(09)

一、引言

伴随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普遍，农村宅基地闲置、荒废、低效利用等问题突出。^[1]为缓解城乡建设用地供需矛盾和提高农村宅基地利用效率，国家出台了在试点地区推行宅基地退出政策，鼓励农户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2]然而，受现有宅基地退出的内涵和外延不清晰、补偿标准不合理、补偿程序不透明、增值收益分配不均、多元补偿方式未建立等影响，^[3]农户对宅基地退出政策满意度有待提升。^[4]农户作为理性经济人，为追求效用最大化，将综合考量参与宅基地退出的成本和收益，^[5]这将直接影响其政策满意度判断。同时，在坚持农户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的前提下，农户宅基地的权利保障能够在宅基地退出中对行政权力形成制约，维护农户应得收益。权利保障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政策满意度的影响不容忽视。此外，近年来国家大力推进农村信息化。^[6]截至 2016 年，中国已经有 99.5%村通电话，82.8%的村安装有有线电视，89.9%的村通宽带互联网，农村信息化日益完善，农户信息获取和信息处理能力不断提升。宅基地退出政策满意度是农户在有限信息环境下做出的评价。^[7]农户信息能力的改变，必定对其政策满意度产生影响。因此，权利保障和信息能力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政策满意度的具体机理如何？本文将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视角对上述问题展开研究，以期在现有政策背景下提高农户宅基地退出政策满意度、推进宅基地退出政策实践提供参考。

纵观已有文献，学者们从宅基地退出补偿模式、补偿标准、收益分配等方面对宅基地退出政策进行评价。^[8~11]但大多从理论上进行宅基地退出政策利与弊的分析，少有学者基于农户微观视角进行宅基地退出政策评价或满意度的实证分析。鉴于此，本文以安徽省金寨县农户为研究对象，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权利保障与信息能力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政策满意度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信息能力在权利保障对农户政策满意度影响中的调节作用，以及政策认知在信息能力对农户政策满意度影响中的中介作用。

作者简介：孙鹏飞 博士研究生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陕西杨凌 712100

赵凯 教授 博士生导师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陕西杨凌 712100

基金项目：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专家咨询委员会项目“农户宅基地有偿退出模式及优化研究”（编号：RXX2019015A）；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粮食主产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模式及运行机制研究”（编号：15XJY01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 权利保障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政策满意度的影响

农户宅基地权利保障可分为实体性和程序性权利保障，其中，实体性权利是农户在宅基地退出中依法获取货币补偿、住房安置、社会保障等实际利益的权力；程序性权利是农户在宅基地退出中具有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12]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政策核心利益主体的目标实现程度是影响政策绩效（即政策满意度）评价的关键因素。^[13]而农户宅基地实体性权利保障水平的改善，能够打破农户作为弱势群体长期被排除在外的收益分配格局，增加农户在宅基地退出中所获补偿，有利于其达到预期收益目标，对宅基地退出政策有较高评价；农户程序性权利保障水平的改善，能够提升农户在宅基地退出中参与谈判的能力，顺畅地表达自身利益诉求。^[14]同时，能够加强群众监督力度，维护退出程序公正，有效制约宅基地退出中违法违规的行为，最大限度的争取和保障自身的权益。^[15]因此，宅基地退出中农户权利保障水平越高，越易实现其预期收益目标，越有利于提高其宅基地退出政策满意度。据此，提出假设 1。

H₁：农户宅基地权利保障水平对其宅基地退出政策满意度具有正向影响。

2. 信息能力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政策满意度的影响

信息能力指农户依据信息需求，检索、判断、组织、利用信息的能力。^[16]信息能力的提升，能够通过增加信息获取数量，提高信息处理质量，实现农户宅基地退出信息获取的准确性、详实性，提高农户宅基地退出政策认知度。而政策认知的提高，能够促使农户更好的理解政府的政策导向，把握我国宅基地改革方向，明晰宅基地退出政策在改善其生活方式上的积极作用，增加农户对政策实施效益和价值的认同度，^[17]提高其政策满意度。同时，根据顾客满意度理论，宅基地退出可视为一种“特殊商品”，其生产、运营均需承担相应成本。农户政策认知越高，越能增加农户对宅基地退出成本的感知，通过降低其产品价格感知增加其感知价值，进而提高其政策满意度。反之，对购买宅基地退出这项“特殊商品”产生过高的价格感知，不利于其政策满意度的提高。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2。

H₂：农户信息能力对其宅基地退出政策满意度具有正向影响。

3. 信息能力在权利保障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政策满意度影响中的调节作用

权利保障的改善，能够打破农户在宅基地退出中收益分配不均的格局，充分表达自身利益诉求，加强群众监督，维护退出程序公平，保障应有权益的实现。现实中，由于我国宅基地退出政策法律、法规不健全，保障措施不完善，^[18]农户权利保障结果不确定，这会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政策满意度产生影响。而农户信息能力的提升，能够增加其对宅基地退出政策的了解，有助于农户合理、合法争取自身应得权益，避免社会冲突发生，降低权利保障效应的不确定性。同时，根据行为转变理论，意识作为行为转变的内在驱动力，^[19]同样有助于权利保障效应的发生。信息能力的提升，有助于农户提高宅基地价值认知，形成维权意识，^[20]消除权利保障效应的不确定性和随机性，从而增强权利保障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政策满意度的正向影响。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3。

H₃：信息能力在权利保障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政策满意度影响中起增强性调节作用。

此外，不同类型信息能力对权利保障影响的调节作用可能存在差异。信息能力可分为信息获取和信息处理能力，其中，信息获取能力是个体搜索、收集信息的能力，信息处理能力是个体处理、读取到有价值信息的能力。^[21]农村信息化普及和发展，丰富了农户信息获取媒介，^[22]整体上提升了农户信息获取能力。但需要指出的是，受农户人力资本水平低限制，其对所获取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缺乏判断，农户所获取信息无法有效发挥作用。^[23]而信息处理能力的提升，能够使农户真正掌握宅基地退

出核心信息，发挥信息的最大利用价值。因此，信息能力的提升，能够增强权利保障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政策满意度的正向影响，在该路径中更多的是信息处理能力发挥作用。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4。

H₄: 农户信息获取能力和信息处理能力对权利保障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政策满意度的调节作用可能存在差异。

三、研究设计

1. 变量选取

(1) 因变量。本文因变量为农户宅基地退出政策满意度。借鉴谢晋、蔡银莺的研究，^[24]基于政策满意度的概念，结合我国现阶段各试点区宅基地退出政策实施程序和现状，本文从政策内容、政策实施过程和政策实施效果 3 个方面构建宅基地退出政策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熵权法和专家打分法相结合的主客观赋权法测算各项指标权重（见表 1），进而测度农户宅基地退出政策综合满意度。

(2) 核心自变量。本文核心自变量包括权利保障和信息能力变量。其中：

对于权利保障变量，基于权利保障的概念，本文选用农户选择的在宅基地退出中得到实际落实的权利种类来衡量农户的权利保障状况。可供农户选择的权利包括在宅基地退出中依法享有的货币补偿权、住房安置权、社会保障权（实体性权利），以及对宅基地退出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程序性权利）。

表 1 农户宅基地退出政策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

综合指标层	具体指标层	综合指标权重
政策内容	对退出补偿标准的满意度	0.075
	对退出补偿方式的满意度	0.070
	对退出补偿账务公开的满意度	0.081
	对退出补偿资金监督管理的满意度	0.073
	对退出补偿相关配套政策的满意度	0.065
政策实施过程	对退出政策协议签订的满意度	0.070
	对集体成员资格权确认工作的满意度	0.051
	对宅基地面积测量的满意度	0.069
	对所获补偿核算的满意度	0.087
	对所获补偿发放及时性的满意度	0.079
政策实施效果	对退出补偿弥补损失效果的满意度	0.101
	对退出后建设用地利用管理的满意度	0.065

对退出后生活适应性的满意度	0.114
---------------	-------

注：(1)上述指标层满意度评价赋值均为：1=很不满意；2=不满意；3=一般；4=满意；5=很满意。(2)综合指标权重=专家打分法所测权重×0.546+熵权法所测权重×0.454。受篇幅限制，文章仅展示综合指标权重。

对于信息能力变量，参考王绪龙等人的研究，本文将其分为信息获取和信息处理能力。信息获取能力用农户通过电视等途径获取外界信息频率进行衡量，信息处理能力用农户通过现代化手段提取宅基地退出有效信息的能力进行衡量。

(3)中介变量。本文选择政策认知作为中介变量，进一步分析农户信息能力是否通过影响政策认知，进而影响其它宅基地退出政策满意度。其中，政策认知用农户对宅基地退出政策的了解程度进行衡量。

(4)控制变量。包括户主特征、家庭特征和宅基地特征3个方面。其中，户主特征变量包括户主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家庭人口数、需抚养人口数、家中是否有村干部和家庭收入；宅基地特征变量包括宅基地面积、宅基地是否确权和住房类型（见表2）。

2. 模型设定

(1)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本文因变量属于连续型变量，选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构建模型如下：

$$y_i = \alpha_i + \beta_{i1}RN + \beta_{i2}IA + \beta_{i3}RN \times IA + \gamma_{ij}X_{ij} + \epsilon_i \quad (1)$$

式(1)中， y_i 为农户宅基地退出政策满意度； RN 为农户权利保障变量； IA 为农户信息能力变量； $RN \times IA$ 为农户权利保障与信息能力变量的乘积项，以检验信息能力对权利保障影响的调节作用； X_{ij} 为第*i*个农户的第*j*个控制变量， β 、 γ 为待估系数， ϵ 为扰动项。且(1)式模型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处理。

(2)中介效应模型。Baron R Mand Kenny D A(1986)提出检验中介变量的因果效应逐步回归法。^[25]为检验政策认知在信息能力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政策满意度中的中介作用，本文依据上述方法设定中介效应模型如下：

$$y_i = \alpha_i + \beta_{i1}IA + \gamma_{ij}X_{ij} + \epsilon_i \quad (2)$$

$$z_i = \alpha_i + \beta_{i1}IA + \gamma_{ij}X_{ij} + \epsilon_i \quad (3)$$

$$y_i = \alpha_i + \beta_{i1}IA + \phi z_i + \gamma_{ij}X_{ij} + \epsilon_i \quad (4)$$

(2)~(4)式中， y_i 表示农户宅基地退出政策满意度； IA 表示农户信息能力； z_i 表示信息能力影响农户政策满意度的路径，即政策认知；控制变量、待估参数、随机干扰项等与(1)式基本保持一致。

四、估计结果与分析

首先，本文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VIF值均小于10，不存在共线性问题。进而运用Stata14.0软件，利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探究权利保障、信息能力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政策满意度的影响（见表3）。其中，模型1仅引入权利保障、信息能力变

量；模型 2 引入权利保障、信息能力和户主特征变量；模型 3 引入权利保障、信息能力、户主特征和家庭特征变量；模型 4 则引入权利保障、信息能力变量和所有控制变量。

表 2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	均值	标准差
宅基地退出政策满意度	采用熵权法和专家打分法所测得分	3.686	0.897
权利保障	农户在宅基地退出中落实的权利种类(种)	4.406	1.249
信息能力			
信息获取能力	通过电视等途径获取外界信息频率	3.358	1584
信息处理能力	通过现代化手段提取有效信息能力	2.310	1279
政策认知	对宅基地退出政策的了解程度	2.686	1421
户主特征			
户主性别	男=1；女=0	0.585	0.493
户主年龄	户主实际年龄(岁)	54.921	13.292
户主受教育程度	户主受教育年限(年)	6.062	3.805
家庭特征			
家庭人口数	家庭总人口数(人)	4.218	1721
家庭需抚养人口数	家庭需赡养人口数(人)	2.097	1269
家中是否有村干部	是=1；否=0	0.047	0.204
家庭总收入	农户家庭总收入(万元)	7.386	6.499
宅基地特征			
宅基地面积	农户宅基地总面积(平方米)	177.371	93.283
宅基地是否确权	是=1；否=0	0.971	0.227
住房类型	土瓦=1；砖瓦=2；砖混=3；框架=4	3.890	0.426

注：通过电视等途径获取外界信息频率（不看=1；几乎不看=2；一般=3；频率较高=4；频率很高=5）；通过现代化手段提取有效信息能力（非常差=1；较差=2；一般=3；较好=4；非常好=5）；对宅基地退出政策的了解程度（不了解=1；了解一点=2；一般=3；比较了解=4；非常了解=5）。

表 3 权利保障、信息能力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政策满意度影响的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	------	------	------	------

权利保障	0.270*** (0.037)	0.279*** (0.037)	0.288*** (0.036)	0.278*** (0.037)
信息能力				
信息获取能力	0.050* (0.029)	0.052* (0.029)	0.057** (0.028)	0.056** (0.028)
信息处理能力	0.065* (0.037)	0.064* (0.037)	0.070* (0.036)	0.071** (0.035)
控制变量	未控制	部分控制	部分控制	已控制
绝对系数 R ²	0.191	0.210	0.269	0.279
F 值	26.000	12.410	10.780	8.820
P 值	0.000	0.000	0.000	0.000

注：*、**、***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中为标准误，下同。

1. 权利保障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政策满意度的影响

由表 3 可知，权利保障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政策满意度有正向影响，假设 1 得以验证。权利保障的改善，能够打破农户作为弱势群体长期被排除在外的收益分配格局，有利于农户充分获取宅基地退出的直接信息，顺畅地表达自身利益诉求。同时，能够加强群众监督力度，维护退出程序公正，有效制约宅基地退出中违法违规的行为，最大限度的维护自身权益，争取和保障预期收益目标的实现。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目标实现程度是影响政策绩效（即政策满意度）评价的关键因素，农户预期目标的实现有利于提高其政策满意度。

2. 信息能力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政策满意度的影响

表 3 中模型 1~4 的估计结果显示，信息获取和信息处理能力均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政策满意度有正向影响，验证了假设 2。可能的解释是：信息能力的提升，能够增加农户信息获取数量，提高农户信息处理质量，实现农户宅基地退出信息获取的准确性、详实性，提高农户宅基地退出政策认知。而政策认知的提高，能够促使农户更好的理解政府的政策导向，增加农户对政策实施效益和价值的认同度，使农户对政策做出正面评价。同时，根据顾客满意度理论，宅基地退出可视为一种“特殊商品”，其生产、运营均需承担相应成本。农户政策认知越高，越能增加农户对宅基地退出成本的感知，通过降低其产品价格感知增加其感知价值，提高其政策满意度。

3. 信息能力在权利保障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政策满意度影响中的调节作用

为探究信息能力在权利保障农户宅基地退出政策满意度影响中的调节作用，本文在公式（1）中加入权利保障与信息获取能力、权利保障与信息处理能力交互项重新进行回归，得到结果见表 4。其中，模型 5 仅引入权利保障与信息获取能力交互项，模型 6 仅引入权利保障与信息处理能力交互项，模型 7 则同时引入权利保障与信息获取能力、信息处理能力的交互项。

表 4 信息能力对权利保障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政策满意度调节作用的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名称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权利保障	0.245*** (0.039)	0.208*** (0.042)	0.173*** (0.044)
信息能力			
信息获取能力	0.030*** (0.009)		0.019* (0.011)
信息处理能力		0.026*** (0.008)	0.016* (0.009)
权利保障*信息获取能力	0.011** (0.005)		0.010* (0.005)
权利保障*信息处理能力		0.023*** (0.007)	0.021*** (0.007)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绝对系数 R ²	0.303	0.311	0.331
F 值	9.930	10.330	9.830
P 值	0.000	0.000	0.000

表 4 中模型 5~7 的估计结果显示, 权利保障与信息获取能力、信息处理能力的交互项均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政策满意度有正向影响, 验证了假说 3。权利保障的改善, 有利于农户在宅基地退出中最大限度的维护自身权益, 提高其政策满意度。然而, 受限于宅基地退出政策法律、法规不健全, 保障措施不完善, 农户维权容易引发社会冲突。权利保障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政策满意度的影响, 由于其不确定性, 受到制约。而信息能力的提升, 有助于农户在政策规定的补偿标准、补偿方式范围内, 合理、合法争取自身应得权益, 形成理性的维权意识, 避免社会冲突发生, 从而消除权利保障效应的不确定性和随机性, 增强权利保障的正向影响。

此外, 本文深入探究的另一个问题是, 不同类型信息能力对权利保障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政策满意度的调节作用是否存在差异。由上文分析得到, 信息获取能力和信息处理能力均能增强权利保障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政策满意度的有利影响。但从影响强度看, 信息处理能力对权利保障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政策满意度的增强作用要强于信息获取能力。原因在于: 伴随农村信息化建设不断完善, 农户信息获取能力提升。然而, 受农户人力资本水平低限制, 其对所获取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缺乏判断, 农户所获取信息无法有效发挥作用。而信息处理能力的提升, 能够使农户真正掌握宅基地退出核心信息, 发挥信息的最大利用价值。对样本统计结果也显示, 在所调查的宅基地退出户中, 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农户占 56.71%, 人力资本水平低成为其普遍特征。且对该部分农户调查发现, 仅有 21.83% 的农户认为其能够判断他人所告知信息的准确性, 证实农户人力资本水平低, 限制了农户所获取宅基地退出信息作用的有效发挥。因此, 信息能力的提升, 能够消除权利保障效应的不确定性和随机性, 进而增强权利保障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政策满意度的正向影响, 在该路径中更多的是信息处理能力发挥作用。

4. 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

(1) 内生性检验。农户宅基地退出政策满意度, 影响其与政策执行者 (如村镇干部等) 联系的紧密程度, 会对其权利保障

产生影响，两者存在因果关系。对于该问题的处理，本文使用“除受访者自身外同一村庄其他受访者的平均权利保障水平”作为受访者权利保障的工具变量进行 2SLS 估计（见表 5）。在同一村庄内部，某个体权利保障水平受村庄其他人权利保障水平的影响；同时，其他人的权利保障水平与该个体宅基地退出政策满意度并不直接相关，满足工具变量选取条件。表 5 显示，处理内生性问题后，本文结论未发生显著变化。可能的解释是：样本农户亲友中村镇干部偏少，其它宅基地退出政策满意度的提高，难以通过增进与村镇干部往来的途径提升其权利保障状况，内生性问题受到弱化。

表 5 权利保障、信息能力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政策满意度影响的模型估计结果（2SLS）

变量名称	模型 8	模型 9	模型 10
权利保障	1.045* (0.544)	1.029* (0.526)	1.058** (0.525)
信息能力			
信息获取能力	0.091** (0.042)		0.096** (0.039)
信息处理能力		0.077** (0.037)	0.076** (0.033)
权利保障*信息获取能力	0.015** (0.007)		0.013* (0.007)
权利保障*信息处理能力		0.035* (0.019)	0.034** (0.017)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wald 检验值	71.750	66.600	80.790
P 值	0.000	0.000	0.000

(2) 稳健性检验。考虑到选取的模型会对回归结果产生影响，本文进而选用分组回归模型，探究权利保障、信息能力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政策满意度的影响，以进行稳健性检验（见表 6）。具体为：以所有样本农户信息获取能力均值为标准，将该数值小于均值的定义为低信息获取能力农户，将该数值大于或等于均值的定义为高信息获取能力农户，对比权利保障对两组农户宅基地退出政策满意度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分别见模型 11、模型 12）。表 6 显示，权利保障对两组农户政策满意度均正向影响显著。但从影响强度看，权利保障对高信息获取能力农户宅基地退出政策满意度的正向影响要强于低信息获取能力，即信息获取能力能增强权利保障的有利影响。

以所有样本农户信息处理能力均值为标准，将该数值小于均值的定义为低信息处理能力农户，将该数值大于或等于均值的定义为高信息处理能力农户，对比权利保障对两组农户宅基地退出政策满意度影响的差异（分别见模型 13、模型 14）。表 6 显示，权利保障对两组农户政策满意度均正向影响显著，但权利保障对高信息处理能力农户的正向影响要强于低信息处理能力，即信息处理能力能增强权利保障的有利影响。同时，权利保障对低信息处理能力和高信息处理能力两组农户宅基地退出政策满意度影响系数绝对值差值较大，为 0.099，而在低信息获取能力和高信息获取能力两组，差值仅为 0.038。这表明信息处理能力的调节作用要强于信息获取能力。该结论证实前述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表 6 权利保障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政策满意度影响的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模型 11	模型 12	模型 13	模型 14
权利保障	0.269*** (0.074)	0.307*** (0.046)	0.218*** (0.063)	0.317*** (0.043)
其他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绝对系数 R ²	0.183	0.298	0.264	0.263
F 值	2.440	6.310	3.080	6.140
P 值	0.000	0.000	0.000	0.000

5. 政策认知在信息能力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政策满意度中的中介作用

上文提及，信息能力会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政策满意度，原因在于：信息能力的提升，能提高农户政策认知。而政策认知的提高，有利于农户增加对政策实施效益和价值的认同度，增加对宅基地退出成本的感知，通过降低其产品价格感知增加其感知价值，有助于农户提高其政策满意度。然而，上述分析未经验证，政策认知是否真正在信息能力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政策满意度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仍需进一步探究。对此，本文基于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信息能力是否通过影响农户政策认知，进而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政策满意度。

(1) 政策认知在信息获取能力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政策满意度影响中的中介作用。表 7 中回归结果显示，信息获取能力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政策满意度有正向显著影响（见模型 15）。同时，信息获取能力对农户政策认知正向影响显著（见模型 16）。此外，加入中介变量政策认知后，信息获取能力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政策满意度仍具有正向显著影响（见模型 17）。借鉴温忠麟等验证中介效应显著性的方法，^{[26][27]}可知政策认知具有部分中介效应。信息获取能力通过提升农户政策认知，进而提高农户宅基地退出政策满意度。

表 7 政策认知在信息获取能力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政策满意度的中介作用验证

变量	模型 15	模型 16	模型 17
信息获取能力	0.056** (0.028)	0.089* (0.048)	0.054** (0.026)
政策认知			0.070** (0.032)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绝对系数 R ²	0.279	0.146	0.279

(2) 政策认知在信息处理能力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政策满意度影响中的中介作用。表 8 中回归结果显示, 信息处理能力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政策满意度有正向显著影响(见模型 18)。同时, 信息处理能力对农户政策认知正向影响显著(见模型 19)。此外, 加入中介变量政策认知后, 信息处理能力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政策满意度仍正向影响显著(见模型 20)。政策认知具有部分中介效应, 信息处理能力通过提升农户政策认知, 提高农户宅基地退出政策满意度。总结得出, 政策认知在信息能力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政策满意度影响中具有中介作用。再次证实上文论述结果的准确性。

表 8 政策认知在信息处理能力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政策满意度的中介作用验证

变量	模型 18	模型 19	模型)0
信息处理能力	0.071** (0.035)	0.305*** (0.059)	0.063* (0.037)
政策认知			0.061** (0.034)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绝对系数 R ²	0.279	0.203	0.276

同时, 值得注意的是, 信息处理能力对农户政策认知的影响系数为 0.305, 信息获取能力该系数仅为 0.089, 信息处理能力在对农户政策认知影响中发挥主要作用。这从另一角度验证: 虽农户信息获取能力提升, 但受人力资本水平低限制, 农户所获取信息无法有效发挥作用, 而信息处理能力能够使农户真正实现信息的最大利用价值。信息能力的提升, 能够增强权利保障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政策满意度影响, 更多的是农户信息处理能力消除权利保障效应不确定性和随机性的结果。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安徽省金寨县 335 户农户的微观数据, 实证分析了权利保障、信息能力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政策满意度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 权利保障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政策满意度有正向显著影响。第二, 信息能力(包括信息获取能力和信息处理能力)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政策满意度同样正向影响显著。第三, 信息能力能够增强权利保障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政策满意度的正向影响, 信息获取能力和信息处理能力的增强效应均显著, 且信息处理能力的增强作用强于信息获取能力。第四, 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分析表明, 政策认知在信息能力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政策满意度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 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 切实保障农户在宅基地退出中应有权利。充分发挥乡村自治组织作用, 使农户参与宅基地退出补偿标准确定、补偿方式选择等重要环节, 协商监督地方政府和村干部在宅基地退出中的行为。第二, 提升农户信息能力。完善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拓宽农户信息获取渠道; 注重对农户进行信息应用的培训, 提高农户综合素质, 消除信息作用发挥面临的人力资本限制。第三, 加强对宅基地退出政策的宣传和解读。政府应利用电视、网络等途径, 普及宅基地退出政策法规知识; 同时成立宣传培训工作组, 深入村屯, 现场宣传、解读宅基地退出政策。

参考文献:

-
- [1]王兆林, 杨庆媛, 骆东奇. 农民宅基地退出差异性受偿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土地科学, 2018, (09).
- [2]郭晓鸣, 虞洪. 建立农村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机制的现实分析与政策构想——基于四川省的实证研究[J]. 农村经济, 2016, (05).
- [3]穆向丽, 巩前文.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中农民宅基地增值收益形成及估算[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03).
- [4]孙鹏飞, 赵凯等. 风险预期、社会网络与农户宅基地退出——基于安徽省金寨县 626 户农户样本[J]. 中国土地科学, 2019, (04).
- [5]胡银根, 余依云等. 基于成本收益理论的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有效阈值——以改革试点区宜城市为例[J]. 自然资源学报, 2019, (06).
- [6]程名望, 张家平. 互联网普及与城乡收入差距: 理论与实证[J]. 中国农村经济, 2019, (02).
- [7]朱新华, 蔡俊. 感知价值、可行能力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J]. 中国土地科学, 2016, (09).
- [8]吕军书, 翁晓宇. 农户宅基地退出的补偿意愿调查及政策建议[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01).
- [9]徐四桂, 宋戈等. 农村宅基地退出补偿的经济学分析[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7, (05).
- [10]刘庆乐. 农户宅基地使用权退出价格形成机制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7, (02).
- [11]彭建超, 吴群, 钱畅. 农村土地“增值”对农民市民化实现的贡献研究[J]. 人口学刊, 2017, (06).
- [12]刘向南, 吕图, 严思齐. 征地过程中程序性权利保障与农民满意度研究[J]. 中国土地科学, 2016, (05).
- [13]李凡凡, 刘友兆. 农村居民点整理中参与式管理的满意度效应分析[J]. 农业技术经济, 2018, (06).
- [14]黄长义, 孙楠. 土地征收领域腐败的经济学分析[J]. 管理世界, 2013, (12).
- [15]薛军, 闻勇. 欠发达地区征地制度公平性判定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云南省农户调查的实证研究[J]. 农村经济, 2014, (06).
- [16]Aker J C, Ghosh I, Burrell J. The promise (and pitfalls) of ICT for agriculture initiatives[J].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16, (01).
- [17]石靖, 卢春天, 张志坚. 代际支持、干群互动与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02).
- [18]张勇. 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内在逻辑、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基于农民市民化与乡村振兴协同视角[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06).

-
- [19]姜健, 王绪龙, 周静. 信息能力对菜农施药行为转变的影响研究[J]. 农业技术经济, 2016, (12).
- [20]陈振, 罗遥, 欧名豪. 宅基地“三权分置”基本内涵、功能价值与实现路径[J]. 农村经济, 2018, (11).
- [21]王绪龙, 周静. 信息能力、认知与菜农使用农药行为转变——基于山东省菜农数据的实证检验[J]. 农业技术经济, 2016, (05).
- [22]朱秋博, 白军飞等. 信息化提升了农业生产率吗? [J]. 中国农村经济, 2019, (04).
- [23]董晓林, 孙楠, 吴文琪. 人力资本、家庭融资与农户创业决策——基于 CFPS7981 个有效样本的实证分析[J]. 中国农村观察, 2019, (03).
- [24]谢晋, 蔡银莺. 农户生计资产与耕地保护补偿政策效应的动态响应——以成都市耕地保护基金为例[J]. 中国土地科学, 2017, (08).
- [25]Baron R M, Kenny D A. 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6, (06).
- [26]温忠麟, 侯杰泰, 张雷. 调节效应与中介效应的比较和应用[J]. 心理学报, 2005, (02).
- [27]温忠麟, 叶宝娟. 中介效应分析: 方法和模型发展[J]. 心理科学进展, 2014, (05).